

■新作聚焦 王跃文散文集《喊山应》:

一个“顽固”的现实主义作家的自白

□贺绍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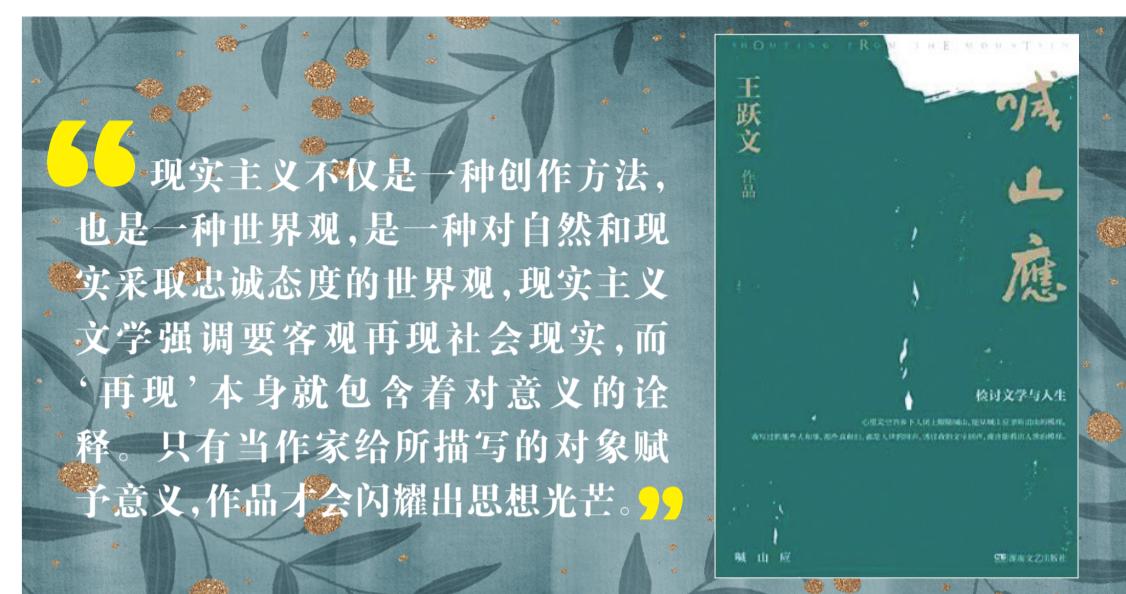
王跃文的散文集《喊山应》并不是将一组散文编辑为一个集子,而是作者围绕自己的文学创作这一主题专门书写的一本书。以1989年在《湖南日报》上公开发表第一篇散文算起,王跃文已有30多年的创作生涯,至今创作成果丰硕。在文学道路上行走到这一步,还能够静下心来进行一番总结,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也应和了孔夫子所说的“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能够达到知天命和耳顺的境界,不就是因为对自己有了一个清醒的把握吗?

《喊山应》分为三大部分:一是“我的文学原乡”,二是“我的文学创作”,三是“我的文学检讨”。湖南溆浦是王跃文的家乡,他视家乡为自己的文学原乡,在第一部分里,他讲述溆浦的历史文化、风物人情以及家族亲人的故事,这一切都化作了无形的力量,加注在他日后的写作之中。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其实都是围绕创作表达自己的文学观和价值观,前者是以创作时间为经,介绍了创作和出版过程中经历的事情;后者侧重于对一些文学现象和问题展开论述,整本书一气呵成,如行云流水般娓娓道来,读起来毫无挂碍之处。王跃文是以非常坦荡、诚实的姿态来书写这本书的,他不遮掩什么,也不粉饰什么,而是敞开心灵面对读者。

我在阅读这本书时,更在意的是书中所传递出的文学观。王跃文在书中说,他是“顽固的现实主义文学者”,这是一个很好的称号。在进行创作的这30余年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当代文学同样也风起云涌、变幻莫测,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作家要做到在创作中保持“顽固”实属不易,但王跃文做到了。他写这本总结性的书,可以说就是在对他的“顽固”进行总结。所以,我将《喊山应》看成是一个顽固的现实主义作家的自白。

现实主义一直是被极力提倡的文学主张,也是当代文学的一面高高矗立的旗帜。但也许是极力提倡的缘故,加之文坛的风风雨雨,现实主义文学变得越来越语焉不详。很多作家所理解的现实主义文学以及他们所进行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其实与真正的现实主义相去甚远。王跃文对此看得非常清楚,他在书中提出“伪现实主义”的概念,他认为,现实主义文学应该直面现实问题,有所批判、有所担当,而伪现实主义则是以逃避的方式处理现实问题。开始写小说时,王跃文还在政府部门工作,看到了官场的种种恶习,他的小说多以官场人物和生活为题材。这时,他选择了以真正现实主义的方式来写这类现实题材,因而给他带来很多的“尴尬”。他说:“如果用伪现实主义手法写作,就不会尴尬了。”长篇小说《国画》的遭遇应该是他所面临的最大尴尬。围绕《国画》的创作,王跃文谈到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精神。他说,文学关乎理想,但实现理想的路径“至少应有批判精神”。在如何处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上,王跃文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理想应该蕴藏于现实,而不是超逸出生活的真实,不能是作家的一厢情愿,如果这样去表现理想的话,“极可能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伪现实主义”。

王跃文在书中多次谈到理想主义,谈到现实生活,也谈到批判精神,在他的现实主义理念里,特别强调要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国画》是他早期的代表作,他称这“是一部孤愤之书,也是一部忧患之书”,也就是说,这部小说的写作与他当时的现实处境以及情感心态密切相关。他这样描述当年的状态:“我曾成天面对忙乱无序的工作,不知何日是尽头。虚无感、荒凉感,时常会堵在胸口。”正是忠于自己的心态,他写出了《国画》以及《无头无尾的故事》《无雪之冬》《秋风庭院》《今夕何夕》等一批中篇小说。后来他写类似题材的小说似乎批判的锋芒有所收敛,这同样与他的心态变化有关,



“现实主义不仅是一种创作方法,也是一种世界观,是一种对自然和现实采取忠诚态度的世界观,现实主义文学强调要客观再现社会现实,而‘再现’本身就包含着对意义的诠释。只有当作家给所描写的对象赋予意义,作品才会闪耀出思想光芒。”

到了写《苍黄》的时候,我的心态越来越平和了。同年轻时的郁愤悲凉相比,内心多了些温暖、理解、宽容。”我们从这种变化中可以感到一种真实的力量。

在王跃文的现实主义版图中,真实占有非常大的比重。这真实不仅包括反映现实生活的真实,也包括作者主体精神的真实。因此,他极力反对在写作中说假话、说违心的话,他认为他的作品“不过是真实表达而已”。王跃文显然对主体精神的真实更加看重。这其实也是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基本原则。现实主义文学强调文学要反映现实的真实,但现实主义文学同时也反对镜子论,认为反映现实并非像镜子式地呈现客观映像,在这里就存在着作家主体对现实的认识和把握,存在着如何透过表象看到现实真实的本质。王跃文说:“小说中的真能达到什么样的深度,与作家的思考力和批判力相关。一个作家没有对生活的审视,没有在作品中体现出他对真理的追求,他的写作是无力的。”在他看来,经过作家思考而获得的真写在小说里面就能达到“比现实还真”的效果,因为它是“经过了作家对现实的提炼与祛蔽,呈现出一种本质上的真。”王跃文不太赞成将现实中真实发生的事情直接挪移到小说中,也多次申辩他小说中的人物是没有原型的,他强调小说是虚构的艺术。如何让虚构的故事具有真实性?王跃文提出了一个“大虚构”与“小真实”相结合的方法:“小说要有大虚构,但一定要有无数的小真实,要有大量生活细节的真实。这些细节真实能把一个大虚构托起来。细节的真实只能从生活中来,这是小说‘出神’的前提。”另外,王跃文从来不是将文学的真实性孤立起来对待,他认为作家反映真实是与其所要表达的思想主题、价值取向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文学当然首先必须真实,因为真是善的起码前提;但仅有现象的真实还不够。文学除了描写和展示,还必须有一种向善的力量,这种善其实就是一种价值判断。”

尽管强调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但王跃文并不因此认为小说可以一味地书写黑暗和丑恶。他说:“我害怕描写黑暗的过程,也不忍把所见的真全盘告诉读者。我有限度地描写着生活的不堪,内心压抑着巨大的痛苦。”《国画》出版后,有人批评王跃文还可以写得再深刻一些,意思是说现实中还有比小说所写的内容更黑暗、更严重的部分。王跃文并不接受这种意见,他说:“假如把生活中严酷的真相毫无保留地表现出来才是所谓的深刻,我并不同意。人间的很多黑暗是不忍看的,不值得用文学来展示。”为此,他提出“作家不

要做女巫”的观点:“有时候,我发现作家似乎成了只擅长讲述恐怖故事的女巫。我们的喉咙越来越不适合歌咏,日渐粗粝的声带只会诅咒和号叫。我们最拿手的仿佛只是写生活的负面,以博得深刻和真实的赞誉;而当我们试图写写正面的生活,则被指为虚假和浅薄。”他不愿意成为一个女巫式的作家,他认为:“文学可以表现恶,但它的精神内核必须是善;写恶的文字是站在恶的泥淖深渊里对人类生命本质的追问,对真理的追问,对美和温暖的渴求。任何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不论它怎样穷形尽相地描写恶、犯罪、病态、贪婪、欲望,甚至歌颂毁灭、诅咒人类,它的精神底蕴却一定是对人类命运的悲悯,对人类沉沦灵魂的救赎。”

王跃文所处的创作环境是一个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交杂和碰撞的时期,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被大量引进,成为文坛被效仿和推崇的新时尚,一度大为风光。在这个过程中,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由对抗逐渐走向融合,进入到相互吸收相互影响的新阶段。不少现实主义作家的确通过对现代主义的借鉴和学习,大大拓展了文学表现的空间。但即使如此,王跃文始终“顽固”地以现实主义为尺度,确定了他的“好小说”标准。他认为好小说的标准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必须讲好故事,第二个层次是“塑造出可以进入文学画廊的人物”,第三个层次是“贡献思想光芒”。如果一部小说能做到这三个层次,就有可能成为文学经典。讲故事和塑造人物确实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功,但不少现实主义作家也许会在故事性和人物塑造上下功夫,却忽略了小说的思想光芒。王跃文不仅强调要有思想光芒,而且还将其置于最高层次上,恰好证明了他对现实主义有着透彻的理解。现实主义不仅是一种创作方法,也是一种世界观,是一种对自然和现实采取忠诚态度的世界观,现实主义文学强调要客观再现社会现实,而“再现”本身就包含着对意义的诠释。只有当作家给所描写的对象赋予意义,作品才会闪耀出思想光芒。”王跃文将其作为好小说最重要的标准,自然特别看重作家的思考能力——“没有理由要求作家们都是思想家,但作家必须得有敏锐的洞察力,对社会的进程和生活的流向有前瞻性的思索。”王跃文在小说写作中始终以这三个层次作为追求,这也是他能够写出好小说的重要原因。尽管他的小说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这一追求依旧可以讨论,但心中有了这三个清晰的目标,哪怕身边涌现出无数新奇的文学,王跃文完全可以自信满满地在现实主义文学道路上“顽固”下去。

■关 注

前几天收到毛时安的新著《结伴而行——海上人物剪影》。“和我相遇、邂逅的人们,是那么多,那么多!多得就像满天的星星。是的,他们多得像星星一样,闪烁在属于我的夜空里。他们每个人都是意蕴无穷解读不完的一个故事一个传奇,都是一片迷人的风景。他们没有来由突然闯进了我的视野我的生活……”毛时安在这本书的序里这样写的,一点没错,许多大师级的人物就这样与他相遇了,碰撞了,摩擦起电了,发生了故事,形成了新的思想和观点。比如巴金、柯灵、王元化、陈伯吹、白桦、蒋孔阳、贾植芳,还有张光年、马烽、玛拉沁夫、王蒙、邓友梅……以上是文学界的,文艺界的似乎更多,比如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吴子牛、黄建新以及画坛上的黄胄、程十发、沈柔坚、杨可扬、方增先、陈佩秋、肖锋、俞晓夫、忻东旺、徐芒耀等。这些名流身上都有故事,与大时代有关,有些私密性很强,强到随便一说就是“十万加”,而且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些故事越来越逼近真相,或者相反,可能越来越像小说电影。不过毛时安不喜欢讲别人已经讲烂了的故事,他着重于个人的体验、观察或考证,从场景到对话,折射出时代的变化和人物内心世界的展开。他是带着评论家的眼光来审视人与时代的关系,审视人与历史的纠结。“在一个大时代的滚滚洪流中,曾有那么多优秀的人、平凡的人和我结伴而行。”毛时安在序里这样强调,而这,正是我格外关注的内容。毛时安如果只与名流结伴,那么他顶多也就是“傍大款”,想成为这个时代的名人;现在他愿意、或者说执意与许许多多平凡的人结伴而行,那么他就成了这个时代一个“了不起的群众”(不是“了不起的盖茨比”)。毛时安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这是需要情怀和信念的。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有不少知识分子本是穷人出身,一开始还能替群众说说话,后来在资本的诱惑下,滑向了人民的对立面,成了资本的代言人和化妆师。这种人是没有情怀和信念的。毛时安是一个有情怀和信念的知识分子,一个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评论家。平时,他密切关注文化界的动向,但其实他的视野很宽,小到街头巷尾,大到市政建设,他都会发表很有见地的议论。在这本《结伴而行》中,他热情洋溢地写到了一批文化界名流。如他对作家赵长天的怀念,刻骨铭心而冷静克制地记录了一个“好人的心跳”,那份艰难岁月极为内敛的情感以至于让排版的年轻编辑都流下了眼泪。他写的是作家,同时也是对一个逝去时代的追忆。值得注意的是,他写到了一些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比如他的同学胡昌龙,在那个荒谬的时代,一起指点江山,一起忧国忧民,一起议论时政,后来各奔东西,套路与许多人一样,奋斗,成才,胡昌龙也有了一份安稳的机关工作。“他生了好几场大病,心肌梗塞,还安装了支架,但每次碰见,依然笑得那样灿烂”,前不久胡同学得了癌症,毛时安及时探望,发现老同学精神饱满,脸色也不错,表现出那一代人的意志与人生态度。胡昌龙似乎没什么大起大落的人生故事,但这正是许多人的命运轨迹,在毛时安笔下却有了一篇小说的节律与情绪以及哲学意味。再比如他遇到了一位同样平凡的中年妇女,是他老家的邮递员。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毛时安与大多数不愿投身运动的青年人一样,百无聊赖,等待着中学毕业后的工作分配,正在这个时候,那位邮递员送来了一份招工通知。照理说,招工通知是有关单位签发的,她只是个微笑着的信使,但是毛时安还是十分感激地记住了她。10年后,她又给毛时安送来了大学录取通知书,4年后的工作通知书,又是她交到毛时安手里的。“虽然我不知道她的名字,但我人生的重要关头,都和她联系着,都和那双传递过数以万计的信件的手联系着。我想这双普通的劳动者的手,曾给一个地区的人们送达过多少决定着他们命运的通知。”就这样,一个叫不出名字的普通女工,在关键节点上给了毛时安莫大的安慰与欣喜,毛时安今天又通过他的温馨文字,给了成千上万个普通人以极大的关爱和感悟。这里面传达的并非是“缘分”这类的廉价的概念,而是“情怀”,这一在当下显得相当稀缺的精神资源。

这本书还收录了毛时安写于20多年前的一篇散文,故事中的女孩经由上海电视台《我想有个家》播出后进入毛时安的视野。当时这个女孩才16岁,因为家庭缘故,过早地承担起照顾因病卧床的母亲的重任,也因此,她几乎享受不到同龄人都能轻松享受的一切,不过她在学习上特别努力,成绩绝对优秀,“她人生的全部要求只是一个能独自歇脚、学习,舔一舔自己伤口的家”。当然,电视台的一档节目很难解决所有问题,只能提醒全社会的关注。毛时安由此想到更多,他肯定了女孩的天赋、孝心以及刻苦学习的精神,映射了社会上种种不合理的现象。他以文字的力量来深化这一主题,起到了更大的传播与启示作用。《天涯有个断肠人》是这本书的最后一篇,毛时安写到了一个从未谋面的朋友,其实是朋友的朋友徐日清,毛时安此前只在微信朋友圈里知道他,经常读到这个名叫“萧楼”的朋友写的文字,他写了很多上海杨浦区的路、人、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杨浦区是中国人阶级的摇篮,……因为萧楼的那些充满感情的文字,那些带着人间烟火气的文字,让我飞回到童年的梦中,飞回到油烟升起的锅台边。”特别有价值的是,萧楼的文字记录了近20年里杨浦区的巨大变化,为大上海的变迁留下了文字与感情记忆,承载着许多人的乡愁。偏偏毛时安在“从前慢杨浦”这个群里看到萧楼去世的讣告,也因此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叫徐日清。徐日清的遗愿是将自己的博文编个文集,在众多朋友的帮助下,这个遗愿可望实现。进入最后环节,朋友请毛时安提个字放在书前表达一下。毛时安义不容辞,饱含感情、洋洋洒洒写了几千字表达了对于作者和养育过自己的老工业区的情感。正因为毛时安愿意与小人物结伴同行,在关键时刻帮他们一把,为他们喊一嗓子,所以他的朋友越来越多,也才能与他们《结伴而行》。

专家研讨晓风长篇小说《湖山之间》

本报讯 11月10日,由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新时代文学研究与实践中心和浙江省高校文艺评论联盟共同主办的晓风长篇小说《湖山之间》研讨会在浙江绍兴举行。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吴义勤出席并讲话,程光炜、艾伟、蔡家园、刘洋、朱文斌、刘家思、朱寿桐、高玉、翟业军、傅小平等专家学者、主办方代表及作者晓风与会研讨。研讨会以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

吴义勤认为,《湖山之间》书写的是崭新的题材和人物,展现出作家敏锐开阔的艺术触角、热切的现实情怀、博大的创作雄心,体现了鲜明的个人风格。小说语言干净雅致,有古风诗韵,但又没有学究气。小说既有深刻的现实批判性、丰厚的知识性和思想性,又有饱满的生活细节,蕴含着深厚的人文情怀和人道主义创作的重要收获。

(浙文)

精神。主人公的喜怒哀乐、心灵变化贴合着时代和生活的脉搏,具有地域文化的烙印和强烈的时代特色,满足了读者的阅读期待。

《湖山之间》发表于《中国作家》,并由作家出版社同步出版单行本。作品以一起学生突发事件为纽带,在时空交错的视阈中串联起各色人物场景,描绘了一对母女的命运史和心灵史,展现出社会转型期的人间万象,城市与乡村的风俗嬗变、两代人的观念碰撞,映射出时代变迁之景。与会者认为,在艺术构思、题材处理、人物描写和思想意蕴方面,《湖山之间》呈现出小说应有的丰富性、复杂性。小说在时空交错的视野中折射出时代变迁中的常与变,将传统叙事与意识流技巧相结合,是近年来知识分子题材创作的重要收获。

(浙文)

由作家出版社同步出版单行本。作品以一起学生突发事件为纽带,在时空交错的视阈中串联起各色人物场景,描绘了一对母女的命运史和心灵史,展现出社会转型期的人间万象,城市与乡村的风俗嬗变、两代人的观念碰撞,映射出时代变迁之景。与会者认为,在艺术构思、题材处理、人物描写和思想意蕴方面,《湖山之间》呈现出小说应有的丰富性、复杂性。小说在时空交错的视野中折射出时代变迁中的常与变,将传统叙事与意识流技巧相结合,是近年来知识分子题材创作的重要收获。

(浙文)

晓风长篇小说《湖山之间》发表于《中国作家》,并由作家出版社同步出版单行本。作品以一起学生突发事件为纽带,在时空交错的视阈中串联起各色人物场景,描绘了一对母女的命运史和心灵史,展现出社会转型期的人间万象,城市与乡村的风俗嬗变、两代人的观念碰撞,映射出时代变迁之景。与会者认为,在艺术构思、题材处理、人物描写和思想意蕴方面,《湖山之间》呈现出小说应有的丰富性、复杂性。小说在时空交错的视野中折射出时代变迁中的常与变,将传统叙事与意识流技巧相结合,是近年来知识分子题材创作的重要收获。

(浙文)

晓风长篇小说《湖山之间》发表于《中国作家》,并由作家出版社同步出版单行本。